

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

张柏然 南京大学 辛红娟 中南大学

摘要: 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的“杂语喧哗”中,在不同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理论思潮论争中,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化理论向度成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对于翻译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对于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认识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这两个向度,积极将当下的众多翻译理论话题纳入这一学术视野,无疑会催生翻译研究的本体自觉。

主题词: 翻译理论;理论向度;元理论;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09)05-0093-05

中国当下的翻译理论领域,出现了对于翻译命题、翻译视角、翻译思潮探讨的“杂语喧哗”的局面,其中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化理论向度构成了关乎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研究向度。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有效展开对于翻译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是理论和现实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面对现实变化所必须做出的学术选择。当下的众多翻译理论话题无疑都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视野,对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认识,也将催生翻译研究的本体自觉。

1 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之理论,思维之思维。元理论研究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作为研究对象;二是经常咀嚼学术传统中的老问题,从而反思并重新整合自身。翻译理论的“元理论”研究也因而成为翻译理论对于自身的审度与省思。在目前的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虽然受到普遍关注与表达,但至少在国内,仍较少有从理论建设的高度对其进行分

析和阐发的学术努力。翻译理论“元理论”问题的产生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理论而言,作为翻译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型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比如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和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演变,使得翻译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不再牢固或受到置疑,从而导致“元理论”问题的产生;就现实而言,社会文化与翻译现状的复杂多变,使得翻译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凸现出来。在当代,翻译理论之为理论的哲学基础变动不居、翻译之为翻译的现实因素复杂多变,使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潮流。实际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对于理性权能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更主要的是对新的意指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这样,就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上理解理论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需要理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这也就是说,包括翻译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关联,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并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年来问世的许多翻译

作者简介: 张柏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双语词典学、语料库语言学, E-mail: zhangboran_327@sina.com。辛红娟,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典籍英译研究, E-mail: xinhongjuan@126.com。

理论著作或论文集 (Venuti, 2000; Cronin, 2003; Tymoczko, 2007; Gentzler, 2008; Baker, 2009, etc.)，大多充满着元理论的焦虑和对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或视角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那只能将理论撕为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翻译理论自身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激发。因为反理论潮流的流行与强大，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因此，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常被当作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在当下的理论场景中，也就出现了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翻译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东西和不相干的要求，来苛责翻译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揭示翻译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翻译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翻译学理论和翻译学学科反思的正途。而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将为我们带来翻译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和“寓言化”。

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使得翻译理论脱离其原先所依凭的观念体系，得以作外向运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那远离其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之物，像“存在”一样成为被发送之物，也即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而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因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而致的翻译理论“本体化”将翻译自身的“存在”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自身的“存在”问题。过去，翻译理论作为人类观念体系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对翻译与翻译现实负责，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个庞大的人类观念库负责，小心翼翼地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双重责任中维系自身的微不足道的存在。现在，翻译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存在”，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翻译理论像是阿克琉斯双脚踩在了土地上一样，一下变得力量无穷：它不再单纯对于翻译现实负责，也正如翻译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翻译理论可以不经介入翻译实践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 (金惠敏, 2004)。

翻译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也因此而获得了无穷的想象力，它所关注的内容也变得无所不包，因而变成一个急剧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于原先所依凭的庞大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体系所限定的狭小思想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驰骋。与此相应，“理论旅行”的问题也是在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存在的基础上凸现出来的理论话题。赛义德认为用“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戈德曼的“误释”问题差强人意，因而提出了“理论旅行”的观点。他认为：

首先，有一个原初点，或类似于原初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创生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能够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原初点移至后一个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系列条件，可称为接受条件或接受过程之必不可少的抵抗条件。正是这些接受条件和抵抗条件使得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他异，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纳）的观念因其在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Said, 1983: 226-27）

不同语言与文化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布尔迪厄（2004: 106-114）基于对全球化中“普遍主义”的一贯驳斥，强调“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认为国际交流常常受到一些造成误解的结构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本文在传播时会脱离他们的语境，也就是本文无法连同语境同时存在，一起传播，这就造成了国际交流中的许多误解。“理论旅行”和“观念传播”这类提法中所使用的隐喻表明：理论或观念在这样的“旅行”中，并不是一种依存于具体文化语境的观念性存在，而是一种独立于语境的主体性存在，它的文化影响与意义方式都将显然不同于语境间的观念碰撞、融合。这就涉及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的另一面结果——翻译理论的“寓言化”。“寓言”不是指作为一种文体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一种意义机制与意义方式：与“隐喻—象征”所代表的对某种巨大的意义体系的内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地表明了意义关系与意义线索的独立于任何观念结构与意义体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纳，2003: 209-219）。翻译理论的“寓言化”，打破了在形而上学或其他独断性、庞杂观念体系中的翻译理论与现实的单向

度的、必然性的意义关联,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双向的、多元的、超然的意义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关系、意义方式与意义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学之外的关系、方式、方向,是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旋涡中,保证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条件。

中国具有悠久的翻译理论元理论思考的学术传统。中国古代的诗性哲学与文化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一元中心的、规范性的意义体系,理论思维面对妙不可言的诗性语言时,元理论方面的惴惴不安几乎成为一个历史情结。重玄重悟的老庄哲学,尤其是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则为元理论的“惴惴不安”提供了哲学基础,使元理论、元话语得以被纳入理论的内在构成之中。当代翻译理论如果能够承继这一学术传统,在新的文化范型中进行元理论思考,不仅有利于找到一个可以与古代翻译理论资源进行对话与整合的理论增长点,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自信度与对相关翻译理论问题的阐释力。

客观地说,中国当代翻译理论领域在元理论思考方面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它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到、但却并没有得到合理表达与有效处置的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元理论问题对其研究者本身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但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迅速改变,对翻译理论元理论思考提出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迫切的需求。面对这一学术需求,翻译学人投入了新一轮的理论追索。那些驰骛于各种层出不穷的西方理论新潮中往而不返的人,可能都是面对元理论挑战而做出的某种应对,但他们的应对不仅没能深入元理论内核,反而成为一种对翻译理论元理论的规避。一些冠以“元”理论名目的理论建构与专题研究,也仍达不到“元”理论思考所需的理论高度。由于缺乏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强大理论思维与哲学传统,元理论思考的缺憾并非简单的水平高低问题,而是类似结构性的缺陷,需要学人们付出超常的关注与学术努力。翻译理论的学科特质决定,我们的翻译理论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理论,因而,在日益高涨的“后学”理论氛围中,我们仍需保持元理论的向度。简单、直义地理解与接受“后”学话语,对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弃之不顾,将会直接威胁到翻译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将极大地戕害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内在构成。

2 翻译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

在高科技和信息传播使人们注目于当前与未来时,文化却恰好成为许多人关注的对象。无论是在中国或在西方,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张隆溪,2004:1)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深深浸濡于文化传统的翻译存在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也必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为了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察方式,种族、性别、文化身份、文化政治与文化权力、文化地理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文化研究的维度与方式被引进,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解释翻译和文化现象的意义空间。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这种“文化转向”对于翻译理论学科的自我反思与在新层次上的重建具有高度的引导价值。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急剧膨胀的世界,这种文化“膨胀”不仅是文化之量的扩大,更包含着文化之质的“异化”: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属性相反,当下的文化正空前地走向物质化。“物质”一词并不是“自然”之物的简单替代品或同义语,也不是按照主体的精神世界加对自然进行工、改造的成果与产品,它是把自然弄得面目全非的自然的掩盖者、否定者,是“异化之物”。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后现代之后,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而只是一种异在的、压迫人的“物的异化”。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存在的对话方式,如果,人已经以异在于他自己的方式存在,以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存在只能遭遇抽象化、概念化的命运。以往的时代里,我们在自明的“文化”规划之下生活和思考;而现在,文化本身问题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成为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可以接近但却无法逼近“本真”。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无限接近那个作为“终极”存在的“文化”:“文化”不是以实体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现成研究对象与观照客体,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孕其间的非透明的存在机制与意义机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现存美学与翻译理论的本体论预设,同时

也要超越现存文化规划，才能真正有效展开其对翻译理论本体的“筹划”。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的学院式研究。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开敞的朝向社会的批判与践行空间；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将关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这正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翻译的政治”。这两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以他们自身的“被殖民者”的切肤之痛，对第三世界文学译至英文语境中的一系列强权与暴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潜意识的控诉，一种文化的抵抗，一种自我身份的书写。文化抵抗和自我身份的书写成为现今西方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当今的中国翻译学术界在紧跟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时，需要冷静、客观地保持中国翻译理论文化研究向度的主体性自觉和作为新的知识形态的自觉。

首先，文化研究的展开需要坚持贯彻主体性的维度。对于解构主义而言，“主体”被敲击，发生断裂，而主体性的这种内在“断裂”意味着对于自我整合的否定，意味着进入陌生的区域使得主体失掉这种整合性而发生“弥散”。而当主体不再能够自足的时候，“他者”又如何能够得以立足？解构主义对于主体性断裂的论述暗示了一个进入翻译政治的基本途径。翻译的政治性，体现在它们对作为主体的认同与共谋。解构主义对于主体性的取消绝对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从独特的角度提醒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曲解围绕着主体性问题而生的文化思考。实际上，无论是个人的生存，还是集体的“共同生存”都不能没有主体性，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2003: 213）甚至还在此意义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政治”的概念，在他看来，“主体政治”是解决“是否能够共同生存”的唯一出路。我们要共同生存，就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拒绝排斥他人，因为主体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力量，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唯有主体才是唯一能在两个世界之间建造必要的桥梁的原动力”。（图海纳，2003: 420）

其次，文化研究的展开需要坚持其作为新的知识形态的自觉。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

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翻译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场域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其核心是翻译学学科价值观念、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方式的有机结合，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西方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始终以其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不断同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不断呈现出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然而，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翻译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却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但西方文化研究观念与方法在中国的空前繁盛，说明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理论所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相通的，因此给中国翻译理论文化研究向度的展开带来了启示和希望。至于如何坚持将翻译学的文化研究向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不妨借用朱立元（2003）的说法——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翻译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翻译学学科发展新现实的、既具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开放体系。在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拓展了翻译批评的视界，打开了文本与文化现象的多元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翻译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意义关联。这一新的知识形态是由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氛围所决定的，与中国当下的现实变动相关联，意味着中国当代学术思想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也注定了文化研究一出现就会引起跨学科的广泛兴趣。

3 结语：翻译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

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和文化理论走向共同揭示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理论不再是纯粹透明、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的万全法则，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再具有玄远而不可达至的距离。在当代，由于理论过去所具有的那种透明性与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复存在，理论成为思想中的现实，现实成为理论最真实的根基和最切实的生长点，二者

之间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有些时候，则更是共同处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状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新关系，是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日益彰显的共同原因。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的重新凸现正是现实变化的结果，而翻译理论文化理论走向所需要坚持的主体自觉和新知识形态自觉也是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需要作出的积极应对和学术选择。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是翻译理论在无所适从的合法性艰危中，对自身存在依据的有力论证、对思想空间的有效拓展和对理论生产动力的全面催动；而翻译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更是直接地转换了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关注重点、观察角度、表意方式与价值坐标。

翻译理论研究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呼唤在文化、社会、传统、民族等宏大集体概念笼罩之下，仍然能随时保持独立性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的今天，对知识分子肩负的学科发展的使命产生的最大阻碍不仅来自外在的压力，社会历史现实的压力，而且也来自知识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所谓职业化。当翻译活动变成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时，知识分子便被局限在他从事的职业范围之内，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有怎样的关系，使得翻译研究工作和翻译实践工作愈来愈脱离翻译的实际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发展出的一套越来越带技术性的特别形式，一套玄虚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学科发展只能成为学术的乌托邦。与此同时，翻译理论与现实历史经验之间也在新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深度的关联。这种新的历史关联性对从事翻译研究工作的学人、对从事翻译理论元理论思考和翻译理论文化理论思考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就中国的翻译理论来说，这样的历史性变动将赋予翻译理论一种现实性品格，同时，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展开，将分别从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改变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内在质地和基本构成。这些正是中国当下的翻译理论所迫切需要的，但必须置于新历史关联中的翻译理论本体论自觉前提之下。□

参考文献

[1] Baker, Mona.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3]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 Said, W. Edwar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Tymoczko, Maria.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7]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8] 阿兰·图海纳.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M]. 狄玉明, 李平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9] 彼埃尔·布尔迪厄著. 李河译. 论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A].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C].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106-114.
 [10] 戴锦华.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A]. 大众文化的神话[M]. 阿兰·斯威伍德著, 冯建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1] 海因茨·迪特尔·基茨泰纳. 19世纪历史哲学的寓言[A]. 论瓦尔特·本雅明: 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C]. 郭军, 曹雷雨.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2] 金惠敏. 文学理论“帝国化”与元文学的可能[N]. 中华读书报, 2004-02-11.
 [13] 张隆溪.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14] 朱立元. 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 文学评论, 2003(3).

Two Orientatio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resent-day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resent-day China, there are two noticeabl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i.e., meta-theory orientation and culture theory orientation, which could be said to be most meaningful to the self-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ny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s of present-day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undoubtedly be integrated into and looked a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se two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are a result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and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this changed real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meta-theory; culture theory